

合於時用： 論晚清以來《說文》的改造應用及 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

鍾哲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以「《說文通訓定聲》改變《說文》體例」、「從清末教科書與辭書論《說文》觀念之變化」兩點，探討清末《說文》觀念之轉變及影響。清代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改造《說文》體例，擴大了字義的內容，給予後世編輯辭典之學者，建立了基礎。如朱起鳳（1874-1948）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編纂《辭通》，其理念與朱氏《定聲》以「假借」方法整理詞義有所相通。朱氏《定聲》改易《說文》體例，超越許慎《說文》原有之框架，正是其重要創見所在，對於近現代辭典產生影響，此為影響清末《說文》觀念轉變的內在因素。再者，清末學部編譯圖書局向民間徵求自編教科書，也可觀察當時學術風氣的轉變。如在晚清報刊所公布的評選書目中，不乏許多以傳統舊學思維編纂教科書者，

* 本文為科技部 108 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字體與國體：清末至民國（1890-1950）漢語之提倡及變革論述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141-001-MY2）」研究成果之一，感謝審查人提供重要之修改意見，謹此聲明。

其中有受清代由傳統小學之識字通經觀念影響，以改編小學經典著作《說文》作為教科書者，如宣澍甘《說文聲母歌括》及桂潔《經註說文徵實》，皆未獲審查通過為部定教科書，學部審查人並建議參考外國辭書，編纂日常實用之辭書，昔日辭書以許慎《說文》為中心之識字通經觀念，已有所改變，《說文》不再是讀書人必備之工具書。當時社會受西學影響，知識體系產生變化，開始強調實用型辭書之重要性，以順應時人認識新事物及時人學習之需求，這是以《說文》為辭書之主的傳統觀念，在清末轉變的外在因素。

關鍵詞：晚清 辭典 報刊 說文 教科書

合於時用： 論晚清以來《說文》的改造應用及 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

鍾哲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清代為《說文》研究極盛的時代，對此現象，學者多以為與明末學術風氣轉變有關。明代中葉以後，學術風氣轉變，考據學風應運而起。到了清初，漢學傳統興起，學者在考證經史的過程中，漸漸了解《說文》之重要性，進而變成清代顯學，極盛於乾隆、嘉慶時期。時人視《說文》為治學通經必讀之書，如朱駿聲（1788-1858）云：「世人曉讀書，而讀書貴先識字，識字然後能通經，通經然後能致用。若不明六書，則字無由識；不知古韻，則六書亦無由通。」^①並將《說文》提昇至與經書相抗衡之地位，故不輕易質疑，如清儒王鳴盛（1722-1797）云：「《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②王氏的說法，展現出當時讀書人對於《說文》極為崇敬之態度。

道光、咸豐年間，外國勢力入侵，清朝國勢日衰，清廷也開始推行多項改革，

① 朱駿聲：〈奏呈〉，《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

② 陳鱣：〈說文解字正義序〉，《小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總頁189。

思效法西學以自強，如設立新學堂、遣送留學生等政策，光緒三十一年（1905），更廢除科舉制度，傳統學術成爲陳舊落伍的象徵，以《說文》爲識字通經之觀念，學子不再重視，而以西學爲風尚。筆者以爲，學術現象或社會風氣的轉變，是受內在及外在的因素持續影響而致，難以一夜之間風雲變色。從清末報刊資料觀察，當時社會受西學影響，知識體系產生變化，開始強調實用型辭書之重要性，以順應時人認識新事物及時人學習之需求，這是以《說文》爲辭書之主的傳統觀念，在清末轉變的外在因素。再者，許慎《說文》在清代與經書之地位相當，經清朝眾多學者的研究及發展，晚清以降，又嘗試對《說文》體例建立新的系統，其中對於後世產生較大影響者，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省稱《定聲》）爲代表，此爲影響清末《說文》觀念轉變的內在因素。本文即從這兩點切入，探討清末《說文》觀念的轉變及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

二、論《說文通訓定聲》改變《說文》體例及其影響

（一）論《定聲》學術評價之轉變

朱駿聲，字豐芑，號允倩，江蘇吳縣人，代表作爲《說文通訓定聲》，近代學者譽朱駿聲爲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清史稿》卷四八一有傳。^③《定聲》流傳甚晚，雖序於道光十三年（1833），但遲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才版成於古黟學署。^④咸豐元年（1851）朱駿聲以知縣的身分，進京獻書給咸豐皇帝御覽，並獲得嘉獎，而其時發生太平天國之亂，刻版亦因兵燹而未及刊印。至朱駿聲過世後，《定聲》才由其子孔彰於同治九年（1870）印行。

關於《定聲》的體例，此書改變了《說文》的編排，將《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拆散，捨形取聲，共得 1137 個聲符，歸納爲 18 部，並將《說文》內容分爲「別義」、「轉注」、「假借」、「聲訓」。胡樸安論《定聲》體例，云：

^③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3236。

^④ 謝增：〈說文通訓定聲跋〉，《說文通訓定聲》，頁27。

其書以「豐」、「升」、「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卦名，分為十八韻部，以一千一百三十七聲母比之，以收許書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實核其書，聲母無从得聲者二百五十四，實得聲母八百八十三字。其字不見正篆，見于說解及自敘中者；有偏旁者；見于小徐本者；見于他書注所引《說文》者，悉為補之，通部正篆九千五七字。大徐「補」、「附」、「俗」三類，及見于經史凡魏晉以前注有音讀者，旁注於篆文之下，五千八百八十九字。見于《方言》、《廣雅》，及子史傳記而無可附麗者，於每部後別葉存之，一千八百四十四字。共計全部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字，蓋已軼出許書之範圍。^⑤

據此，《定聲》重新編排《說文》收字及次序，而當時研究《說文》的學者，對於這樣的改變是有所不滿的。如清末的學者沈盞，其〈說文解字段注考正跋尾〉云：

段金壇之注《說文》也，體博思精，實郵學特出之傑作，雖桂氏《義證》、王氏《釋例》，莫與抗手。若朱氏《通訓定聲》之逞異說以亂家法者，抑毋論已。^⑥

沈盞言朱氏《定聲》「亂家法」，乃是朱書採「以聲統字」、「以聲為綱」的方法，將《說文》全書重新進行編排，這在當時尊崇許學之氛圍中，朱氏此舉必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是為事之必然。朱一新（1846-1894）《無邪堂答問》批評《定聲》，云：

《廣雅》已多後世俗訓，……王氏（念孫）之為疏證，援據精博，亦不過

⑤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364-365。

⑥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1冊（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頁223。

為穿鑿，與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之以多為貴者不同。朱氏書以聲為主，故襲用《經籍纂詁》而無所嫌，然已傷繁允。訓詁之學援引古書，取足證明已說而止，若蔓衍無已、擇焉不精，則博士驢卷也。^⑦

朱一新將王念孫《廣雅疏證》與《定聲》比較，認為朱書「以多為貴、蔓衍無已、擇焉不精」，顯見其對《定聲》評價甚低，稱其「博士驢卷」，則指是書長篇連牘而不得要領。朱駿聲的弟子為《說文通訓定聲》作序跋，對於其師改動許慎《說文》體例，雖是多所稱譽，然亦顯露出當時人質疑之氛圍。如朱駿聲弟子謝增，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撰〈說文通訓定聲跋〉一文，嘗云：

（朱駿聲）平生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導音韻之原、發轉注之、究段借之變，小學之教，斯焉大備。……不敢謂世之必尊必信，然數十百年後，必有寶貴如叔重書者，不著蔡知也。^⑧

是文對於《說文通訓定聲》多加推崇，但文中一句「不敢謂世之必尊必信」，或許點出了《說文通訓定聲》在清代當時的評價不一，但是謝增之文，始終還是尊師的，故云「數十百年後，必有寶貴如叔重書者，不著蔡知也」，相信後世學者會了解《定聲》之學術價值。

朱駿聲現代雖被稱為《說文》四大家之一，然而在清末、甚至民初時，朱駿聲《定聲》的名氣及評價，是遠不及段玉裁（1735-1815）、桂馥（1736-1804）、王筠（1784-1854）三家的。如章炳麟（1869-1936）〈小學答問敘〉云：「近代言小學者眾矣，經典相承，多用通段。治雅訓者，徒以聲誼比類相從，不悉明其本字。《說文》之學，段、桂、嚴、王為上。」^⑨就筆者所見，最早將「《說文》四大家」並舉，是在清末《國粹學報》〈記日本說文會之臨時大會〉一文，是文刊

⑦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4，頁17。

⑧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27。

⑨ 章炳麟：《小學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章氏叢書》上），頁271。

於 1908 年，云：

諸《說文》會中人，為期漢字之普及，特於本月一日（中十月八日）開《說文》會臨時大會於上野公園內之東照官社務所，行祭奠許慎（《說文》之著者）及以下諸人之禮式，同時陳列《說文》研究所要書及古籀拓本類諸書不下五百餘種。其所祭者，為許叔重、徐鉉、徐鍇、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以上中國人）。狩谷掖齋、山梨東川、……（以上日本）等。^⑩

日本《說文》會諸學者為推廣漢字，故在東京上野公園舉行大會，並祭祀許慎及中國、日本《說文》研究大家，其中今所稱《說文》四大家已列名其中，可知朱駿聲學術地位在日本已得到認可，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對於清末學術發展也開始產生影響。民國九年（1920），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將朱駿聲與段玉裁、桂馥、王筠三人並提，云：

清儒以小學為治經之途徑，嗜之甚篤，附庸遂蔚為大國。其在《說文》，則有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⑪

梁氏雖特意將朱駿聲舉為清代《說文》名家，但於此僅羅列書目，並未多作說明。民國十三年（192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討論清代的小學成績時，對於《定聲》頗為讚賞，^⑫並將朱駿聲《定聲》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義證》、王筠《說文釋例》及《句讀》三人並舉，且一一述評。其後丁福保（1874-1952）於民國十七年（1928）編成《說文解字詁林》，^⑬正式提出了

⑩ 不著撰人：〈記日本說文會之臨時大會〉，《國粹學報》第 4 卷第 12 期（1908 年），頁 106-107。

⑪ 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42。

⑫ 同前註，頁 338。

⑬ 周雲青〈說文解字詁林跋〉云：「丁師仲祐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始於癸亥（1923）、至戊辰（1928）歲乃告成。」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 1 冊，頁 16。

「《說文》四大家」的說法。《說文解字詁林》匯集清代研治《說文》的成績，丁福保特意提升朱駿聲《定聲》之地位，亦讓朱書受到學者們的注意及重視。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自敘〉云：

許氏《說文解字》一書，沉霾千載，復發光輝。若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句讀》及《釋例》、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最傑著也。四家之書，體大思精，迭相映蔚，足以雄視千古矣。¹⁴

丁氏特別舉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桂馥《說文義證》、王筠《說文句讀》及《釋例》、朱駿聲《定聲》，為清代治《說文》最傑出的四家，「《說文》四大家」的觀念於焉建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學術地位也因此確立，而實際上，朱氏《定聲》對於清末學術已產生影響，學者逐漸肯定其價值，其後丁氏才能標舉其名。

（二）論《定聲》對於清末學術發展之影響

關於《定聲》學術地位在清末轉變之原因，正是由於《定聲》改造《說文》體例，擴大了字義的內容，強調形聲字之作用，給予後世研究語言文字及編輯辭書之學者，建立了基礎。如朱氏《定聲》以聲統字的編輯方法，對於梁啟超（1873-1929）的識字啓蒙教育方法有所啓發。梁啟超在 1896 年戊戌變法前，嘗發表〈幼學〉一文，文中提及中國文字中形聲字觀念，對於啓蒙識字具有重要之作用，並舉朱氏《定聲》為例，云：

中國文字雖不主於聲，而聲中之義甚多，故形聲一門中，實有妙理可尋，黃公度、汪穰卿皆發此義。黃之說，云如天、巔等音皆有高之意，地、底等音皆有低之意，圓、全、完、旋、還、環等音皆有圓之意；汪之說，云

¹⁴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 1 冊，頁 8。

如古有舊意，而枯、故、沽、固、楛等亦皆有舊意。黃之說《釋名》畧演之，汪之說《說文通訓定聲》間有發明。¹⁵

梁氏從傳統訓詁「因聲求義」之方法，了解到聲音相近或相同之文字，其意義多可相通，據此可作為識字啓蒙之教學方法。再如 1897 年在上海創刊的《蒙學報》，是清末兒童啓蒙刊物，由葉瀚等人創辦及編撰。出版第 38 期後改名《蒙學書報》，出至 72 期終刊。《蒙學報》第一期起所連載之〈啓蒙字書〉，嘗試以英文取代中國反切，便於童蒙，聽中文何音，即辨西文何音，如 A 愛，B 皮，C 西，而文字分類即採《說文通訓定聲》之法，依偏旁得聲字，分類連繫。〈啓蒙字書〉作者葉瀚云：「一輯啓蒙字書，以省部從音為主，原本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十八部音攝，統攝中文韻部。惟朱氏原書，係講古音，其分部依《廣韻》之部目，又有通轉之例。今本書祇取便蒙，仍以坊本平水韻分部為定。」¹⁶據此，《定聲》將《說文》字例重新分類之方法，對於清末教育改革有所啓發。梅家玲以為《蒙學報》對於中國近現代的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過程中，具有創始開新之意義。¹⁷

再者，清末辭書《辭通》的編輯也受《定聲》影響，作者朱起鳳（1874-1948），字丹九，浙江海寧袁花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開始編纂《辭通》，歷時三十餘年，於 1930 年完稿。《辭通》的編纂理念與朱氏《定聲》以「假借」方法整理詞義有所相通，屬於聯綿字之辭典，胡適（1891-1962）民國二十三年（1934）作〈辭通序〉，云：「朱丹九先生的《辭通》在方法上，只是繼續《說文通訓定聲》的『連語』部分，專收連語，而用同聲假借的原則來整理他們、解釋他們。這是《辭通》的主要方法。」¹⁸朱駿聲《定聲》認為假借有所謂「四例八

¹⁵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 16 冊）：幼學，《時務報》第 17 期（1896 年），頁 1-4。

¹⁶ 葉瀚：〈啟蒙字書音目〉，《蒙學報》第 1 期（1897 年），頁 20-25。

¹⁷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徐蘭君、（美）瓊斯（Jones, A.）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35-72。

¹⁸ 朱起鳳：《辭通》（臺北：開明書店，1982 年），頁 2。

用」，其中假借之「八用」中，「單辭形況」，如「率爾」；「重言形況」，如「朱朱」；「疊韻連語」，如「窈窕」；「雙聲連語」，如「次且」，皆可通屬於連語，即今所謂聯綿字。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畧》評論《辭通》云：

《辭通》的最大特點是從聲音的通假上去尋求文字訓詁。它把古書中各種類型的兩個字的合成詞，排比整理，按平上去入四聲分部編次，而以常見的詞列在前面，把和這詞意義相同而形體相異的詞全一一附列於下，說明某詞始用於何時，見於何書，並且指出某詞是某詞的音近假借，某詞是某詞的義同通用，某詞是某詞的字形譌誤。¹⁹

因此，劉葉秋將《辭通》歸類為專門詞典之聯綿詞典。胡適作〈辭通序〉，同時給予《定聲》極高之評價，云：

清朝王念孫、段玉裁、錢繹諸人整理《廣雅》、《說文》、《方言》一類的古辭典，都只是自己作學問，還不是做字典。到阮元計畫的《經籍纂詁》，那才是有意為後來學者做一部辭典，……但全書所收，重在單字，詁訓來源，限於古籍。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成於上述諸書之後，其體例與方法都稍勝前人：體例是一部表示聲音與訓詁變遷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創見的辭書；方法是特別注重「轉注」與「假借」，用為訓詁演變與形聲變異的原則。²⁰

胡適從辭書學之角度評價《定聲》，認為其書會通聲音訓詁，體例與方法都稍勝前人，是一部有創見的辭書。昔日朱駿聲改易經典之大過，已不再受到學者之批評，反而認為《定聲》改易《說文》體例，超越許慎《說文》原有之框架，正是其重要創見所在。

¹⁹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畧》（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年），頁247-248。

²⁰ 朱起鳳：《辭通》，頁1。

朱氏《定聲》對於近代語言文字學家，同時也是辭典編輯者的王力（1900-1986），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王力評論《說文》四大家，首先提出四家中「以段、朱最爲傑出」²¹，並具體說明《定聲》之成就：

朱書的最大貢獻在於全面地解釋詞義。朱氏突破了許氏專講本義的舊框子，進入了一個廣闊的天地。……朱氏的卓見在於認識到引申義與假借義的重要性。一詞多義，是語言中常見的事實；《說文》只講本義，對於多義詞來說，那是很不全面的。當然，《說文》是講字形的書，專講本義是應該的，而且是足夠了的。但是，我們還需要一部全面地講語義的書，《說文》可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如果要敘述多義詞的各種意義，就非敘述引申義和假借義不可。²²

王力以爲，《定聲》最大的貢獻在於字詞的解釋，擴大了以《說文》本義爲中心的系統，強調引申義與假借義的重要性。王力〈理想的字典〉一文，即提出一部理想的字典，要能「明字義孳乳」，說明字義的時代演變軌跡。²³王力所提出「新訓詁學」之概念，其先聲應來自於朱駿聲《定聲》，王力極力推崇《定聲》詞義研究之成就，認爲朱書可與許慎《說文》分庭抗禮，甚至還有超越《說文》之處。王力將《定聲》的學術地位更爲提升，指出其重要之現代意義，並接軌於新時代之學風，如1947年，王力發表〈新訓詁學〉一文，將語義學稱爲新訓詁學，而與舊說之訓詁學作了區別，其云：

因為要顯示訓詁學和語義學在方法上的異同，才把語義學稱爲新訓詁學。……從歷史上去看語義的變遷，然後訓詁學才有新的價值。即使不顧全部歷史而只作某一時代的語義的描寫（例如周代的語義或現代的語義），

²¹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91。

²² 同前註，頁104。

²³ 王力：《王力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62。

也就等於斷代史，仍舊應該運用歷史的眼光。等到訓詁學脫離了經學而歸入了史的領域之後，新的訓詁學才算成立。到了那時節，訓詁學已經不復帶有古是今非的教訓意味，而是純粹觀察、比較和解釋的一種學問了。²⁴

王力受《定聲》字詞釋義研究之影響，以語義學為新訓詁學，提升語義學之學術意義。王力認為研究語義要具備歷史的觀念，並把每個時代的語言都看作有同樣的價值，避免古是今非的教訓意味，打破小學與經學相通的舊觀念。

三、從清末教科書與辭書論《說文》觀念之變化及影響

（一）從清末學部審定教科書析論

中國傳統教育方式，並沒有規定統一的教科書，童蒙多從《三字經》、《百家姓》念起，再讀四書五經，不論書是否讀懂，先以背誦為主。蔡元培（1868-1940）對其童年進入傳統私塾學習之情形，記云：

我以六歲（以陽曆記，若按新法止四歲餘）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經。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²⁵

科舉時代受教育之最終目的，為金榜題名，因此，所學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而

²⁴ 王力：《王力文選》，頁 272-280。

²⁵ 蔡元培：〈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蔡元培全集》第 7 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552。

這些經學義理對於童蒙而言，是極其深奧的，一字一句反覆背誦，常是不知所云。張志公（1918-1997）則以為，傳統語文教育並非只是教學生死讀書，雖然當時許多私塾先生如此作，但只是反映舊社會師資不齊，並不足以代表傳統的經驗。²⁶可是，當時學子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是以記誦為主。且舊時讀書最主要之目的，在於科舉考試，因此專以四書五經為主要之學習內容。

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廢除科舉制度，傳統文人晉升仕途的管道有了重大改變，並推行多項改革，如設立新學堂、遣送留學生等政策，學習西學的風氣極為興盛。當時清廷為展開教育改革，在1905年又設立了主管全國教育行政的專門部門，稱為「學部」，相當於今日臺灣的教育部。1906年，學部設立編譯圖書局編纂各學堂之教科書，然而因當時各式教科書需求太大，編譯圖書局無法及時供給需求，因此向民間徵求自編教科書，如〈學部搜求教科書籍〉云：

學部現參訂中小學教科書，特出示訪查刊行之本及私家著述，以期改良。其示云：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部現擬將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及教授法參考書等，詳加審定，擇其善者頒發各省，以便劃一學制。凡書肆刊行之本及私家編輯稿本，均可隨時郵寄本部，呈請審定。為此出示曉諭，俾眾週知，特示。²⁷

雖然學部主動徵求私人自編教科書，但是自編教科書仍須經過學部審定，才可以發行。若經學部審定後成為學堂課本，可通行全國，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對於作者而言，無疑是很大的光榮。從漢代許慎《說文》到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皆曾將著述上呈朝廷，即在尋求官方正式肯定，以得到不朽的功業。若著述通過學部審查，成為部定教科書，同樣也可以得到榮譽，而且還有版稅的實際利益，所以許多人趨之若鶩，甚至時有佯稱部定的教科書上市，以獲取利益。如〈學部

²⁶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110。

²⁷ 不著撰人：〈學部搜求教科書籍〉，《四川學報》第2期（1906年），頁2。

筭行各省查禁偽造學部審定教科書文〉云：

照得教科圖書，關係教育，至為重要。本部自開部以來，慎選司員，任以審定之事。凡私家著述呈請審定者，無論或准或駁，皆幾經校閱，然後定稿，批示一秉至公，毫無遷就。乃近有無恥之徒，捏造審定科司員官單，石印成一小冊，希圖影射，詐取錢財。誠恐無知書坊，受其愚弄，倘經發覺，與受同科，在招搖者難逃詐取之條，各書坊亦應坐行賂之罪。²⁸

又如〈學部嚴查冒充審定書籍〉云：

學部咨江督有一新書局告白，登學部審定《蒙學鏡》一書，實並未經學部審定，本應嚴究，因念其初犯，從寬免罰，第令登報更正，以杜混冒之風而已。²⁹

教科書為教學之根本，故學部嚴禁偽造，以免貽誤學子。學部對於教科書的審查自有其標準，如 1906 年公布〈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凡例〉、〈第一次審定高等小學暫用書目凡例〉，1910 年又公布中學和初級師範學堂暫用書目凡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撮其要點：（1）對審定的書籍，均附總評及校勘表，指出其不足。（2）提出「寧缺勿濫」的原則，嚴格審定標準，一些課程「尚無適用之本」時，不作審定。（3）準備編訂詞典，以改變各種科學名詞譯名多歧的現象。³⁰

上呈的自編教科書不論是否通過審查，學部都會將評語公告在報刊上，眾人也可知評選的標準，而在清末各式報刊發行達到鼎盛之時，具有很強的傳播效力。如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云：

²⁸ 不著撰人：〈學部筭行各省查禁偽造學部審定教科書文〉，《教育雜誌》第 2 卷第 12 期（1910 年），頁 54。

²⁹ 不著撰人：〈學部嚴查冒充審定書籍〉，《直隸教育雜誌》第 9 期（1906 年），頁 3。

³⁰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383。

清末 10 餘年間，相繼創辦發行的報刊達六、七百種之多（含停刊者），發行量據 1913 年郵政系統運送的報紙印刷品數，就有 51524800 份，圖書出版的種類和數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改變和擴大了人們的時空觀念和認知空間，使先驅人物的精闢思想很快傳導給一般民眾，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③①}

當時報刊文章又常多處轉載，使其流傳更加迅速。因此，評選合格成為部定教科書者，固然符合官方之標準，而落選的書籍同時也能反映，或者帶動當時學術風氣的轉變。晚清報刊所公布的評選書目中，不乏許多以傳統舊學思維編纂教科書者，其中有受清代傳統「識字通經」觀念影響，以改編文字學經典著作《說文》為教科書者。如〈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云：

據呈書悉是書以朱氏《說文通訓定聲》為藍本，間坴己意，雖或傳會，卻非蕡然於六書者所能道。惟編成歌括，意在便初學，詞句不免湊合，向例凡歌括書以其與教科體例不甚相宜，槩不審定。^{③②}

所謂「歌括」即歌訣，昔日以此方式方便記誦。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改變了《說文》的編排，將《說文》部首拆散，捨形取聲，得 1137 個聲符，歸納為 18 部。宣澍甘據此編成歌括，以便初學，但是此法已不合時宜。學部對於以歌括韻語編排的教科書皆不予審定，另見報刊〈學部不審定韻語書〉條，云：

有王偉忠者，以舊日蒙學所讀三字經尚非善本，另著三字韻書，呈請學部審定，學部以其書通體用韻，不合教科之用，不予審定。批中略謂教科書中，或雜用韻語數課，或引歌數句，未嘗不可。惟通體用韻，必多遷就，

③①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 年），頁 442-443。

③② 不著撰人：〈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學部官報》第 137 期（1910 年）。

不能暢發作者旨趣，即不能適合學生心理。³³

在科舉取士時代的教育方式，初學以記誦為先，故以歌括編排內容，最便於記誦，而清末欲建立新式教育，對於童蒙學子之學習，不再側重記誦功夫，而強調循序漸進之養成，因「兒童見聞狹隘、智識單簡，教育之道，當就其舊觀念引起新觀念」³⁴，先講以淺近易懂之事理，再說明難懂之事，就可融會貫通，此即所謂「合學生心理」。

與《說文》體例相關的自編教科書，可反映出清末《說文》觀念轉變之現象者，再如〈成都縣附生桂潔稟呈經註說文徵實一案〉云：

本司批閱所呈經註四冊，部居以形畫分別類字書，而雜廁《爾疋》之義。《說文徵實》所引坳，如《經籍纂詁》之例，而未有其博，未可以說《說文》也，二者皆字書，「經註徵實」之名，未當。……該生所呈，蓋有意於形聲音義之學，而所請經註，乃《爾疋》、《廣雅》之緒餘，謂之經註，體例未安。《說文》有段、嚴、鈕、桂諸大家，而吳、陳、程《說文》引經考、古語考，及王玉樹、邵瑛《說文拈字》、《羣經正字》，諸書已備，所謂「徵實」，未能出其範圍，不見心得新義。若就平生讀書所得條鈔彙記以成一書，莫若仿東、西洋辭書字典之例，就日用字或熟語廣徵博引以彙一冊，猶為體例不紊而見收於方家也。此批書仍發還。³⁵

學部從書名、體例評論桂潔《經註說文徵實》，以為名實不相符。此書體例如阮元《經籍纂詁》，應屬訓詁之工具書，但審查者以為不及《經籍纂詁》廣博。再者，清代《說文》相關研究著作眾多，該書缺乏「心得新義」，因此原書發還，

³³ 不著撰人：〈學部不審定韻語書〉，《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卷第2期（1906年），頁76。

³⁴ 不著撰人：〈論學部編纂之教科書〉，《廣益叢報》第139期（1907年），頁1-3。

³⁵ 不著撰人：〈成都縣附生桂潔稟呈經註說文徵實一案〉，《四川教育官報》第8期（1910年），頁14-15。

未能通過審查。其中值得探討的地方，是文末審查者給予作者的修改意見，建議其「若就平生讀書所得條鈔彙記以成一書，莫若仿東、西洋辭書字典之例，就日用字或熟語廣徵博引以彙一冊」。以讀書筆記的方式著書，為清代學者著述之常見方法，近人林明波《清代許學考》整理清代《說文》著述，列「雜著類」，分為雜考及雜纂二屬，³⁶此類書目數量頗豐，可見清代學者以札記方式著書之特點。學人研治《說文》時，稍有所得即條列存之，累積一定數量即成一書，雖然札記之作，成就不一，但可見學者治《說文》之勤勞，此類著作正是清代《說文》學之內容基礎。清末學風受西學影響而轉變，傳統如《經籍纂詁》之通經解義工具書，在當日教育方針下，已不切實用。因此學部審查人建議原書作者，可「仿東、西洋辭書字典之例」，整理日常生活用字及用語，較符合實用。

前論二書，如宣澍甘《說文聲母歌括》及桂潔《經註說文徵實》，皆未獲審查通過為部定教科書，學部審查人並建議參考外國辭書，編纂日常實用之辭書，昔日辭書以許慎《說文》為中心之識字通經觀念，已有明顯的改變。參考西學之科學方法，編為教科書者，則可得到很高的評價，如馬建忠（1845-1900）《馬氏文通》，獲選為學部審定中學教科書。《教育雜誌》論是書云：

此書本泰西葛郎瑪之例，以九類文字銓釋中國文法，大致以諸有解者為實字，無解者為虛字，其別則實字有五：名字、代字、動字、靜字、狀字是也，虛字有四：介字、連字、助字、歎字是也。始之以正名，終之以句讀，為卷凡十。於王念孫、段玉裁諸書，以為虛實諸字，先後錯用，雖似稍過，而實切中其失。自序謂古今來特創之書，非夸語也。……近時作國文典者頗多，類皆襲其似而未知其所以然，亦可見此書之精審矣。雖非教科書，應審定為參考之善本。³⁷

³⁶ 林明波：《清代許學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嘉新水泥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二十八種，1964年）。

³⁷ 不著撰人：〈學部審定中學教科書提要（未完）〉，《教育雜誌》第1卷第1期（1909年），頁1-8。

「葛郎瑪」為 grammar 音譯，指語法。馬建忠《馬氏文通》，出版於 1898 年，是中國研究漢語語法學的第一部系統性著作。馬氏自言著書動機，在尋求一規律，作為文章識字之方法，即語法學。馬氏以為清代傳統小學之文字、聲韻、訓詁研究，固然有其成果，但常「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因「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返求夫未變之先，難矣」。³⁸文字之形與聲，常有所變化，而馬氏以為從文句中可得出規律，云：「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變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³⁹再者，「《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為近似，然亦時有結籀為病者」，⁴⁰且馬氏自云「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虛、實諸字，先後錯用，自無定例，讀者無所適從。今以諸有解中實字，無解者為虛字，是為字法之大宗。」⁴¹因此，馬氏編寫漢語語法書籍，嘗試從傳統經典的框架外，建立漢語語法學的系統理論。不僅傳授文章之法，同時也開展新的考證途徑。從文例中研究文字，可據而確定字義，現今古文字學考證甲骨、金文字，也常用此種研究方法。胡適對於《馬氏文通》評價甚高，也啟發其文學理論，胡適以為若學子能以文法讀書、作文，則傳統古學將能發揚光大。⁴²

馬建忠《馬氏文通》已思考西學對於當時之衝擊，因此其著述帶有教育改革之涵意，有別於昔日的學習內容及方法，如其檢討私塾教育之弊，嘗云：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聽其終日伊吾，及少長也，則為之師者，就書衍說。至於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於句首者，有殿於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後參差之所以然，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後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⁴³

³⁸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9。

³⁹ 同前註，頁9。

⁴⁰ 同前註，頁16。

⁴¹ 同前註，頁20。

⁴²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17年），頁136-137。

⁴³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頁10。

前已論及，傳統私塾教育講究記誦之工夫，先不論學生是否懂得所背之文，只先反覆誦讀。馬建忠以為，此種學習法過於抽象，使得學生難以具體掌握作文之原理。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云：「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掌握古漢語的寫作能力平均需要十五年左右的學習時間，這樣對學洋文的學生負擔太重，他們無法從事譯書。爲了減輕學洋文的學生掌握本國書面語言的負擔，馬建忠取式於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流行的語法書，1880年代後期開始撰寫漢文語法。」⁴⁴平田昌司以為，《馬氏文通》馬氏心目中的讀者主要是學洋文的學生，此說值得商榷。就筆者研究，馬建忠著書之最大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學習中文的方法，此法適用於本國及外國，並非偏重於外國留學生。《馬氏文通》吸取西學之方法，讓學生能以科學的方法理解文法，進而懂得如何寫文章，達到「切於實用」之功效。馬氏云：

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強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字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財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為他羣所羣。則為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⁴⁵

馬建忠作《馬氏文通》，開啓現代漢語語法學之發展，這並非全是個人學術興趣使然，而是馬氏觀察世變之發展，並檢討傳統語言文字學之得失，嘗試吸收西方語言學之研究方法，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學術，提供學子用一個更具體明確的方式，學習及理解漢語言文字，藉此學道明理，並會通西學之道。所謂「以求夫

⁴⁴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68。

⁴⁵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頁13-14。

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即講求實用，以自立自強於世界，而此與科舉時代識字以通經致用的目的，有很大的轉變。

（二）從清末對於辭書的需求析論

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下，學風巨變，清代乾嘉學術「家家許、鄭」之時代結束，《說文》不再是讀書人必備之工具書。時人思考的是如何改造《說文》以合時用，如華通齋〈改良文字會之緣起〉云：

曩日習《說文》，未見有絲毫益處，渡海以來，頗聞西人教授文字之法，又習見學校教授字母之法。乃悟吾國字書（《說文》亦名字書）頗有益於文字之研究，若能編成淺短之篇，去其舊法而參以新法，俾小校教員有所循據，則為益洵非淺鮮。其法宜先從字母入手，而字母之中，宜先從象形者入手。⁴⁶

此「改良文字會」，為歐洲留學生所發起，目的在開文字改良之風氣。文中提及「曩日習《說文》，未見有絲毫益處」，指傳統識字通經之觀念，在當日已無用於生計。因時人讀書已不須閱讀艱澀的經文，自然不需能識字解經的《說文》以作為輔助。留洋學生受西方教育觀念影響，提議將《說文》改為「淺短之篇，去其舊法而參以新法」，並從字母部首入手，才能符合實用之學習需求。

清末有主張以拼音文字之「世界語」（即 Esperanto，或譯為萬國新語）取代漢語言文字者，提出以世界語解釋《說文》字形，可為世界之用。如劉師培（1884-1919）〈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

今欲擴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說文》一書，譯以 Esperanto（即中國人所謂世界語）之文，其譯述之例，則首列篆文之形，或並列古文、籀文二體，切以 Esperanto 之音，擬以 Esperanto 相當之義，並用彼之文詳加解釋，使

⁴⁶ 華通齋：〈改良文字會之緣起〉，《直隸教育雜誌》第8期（1907年），頁101-113。

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窮其造字之形義，以考社會之起源，此亦世界進步之一端也。⁴⁷

Esperanto 這個詞，是波蘭人柴門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 1859-1917），在 1887 年發表他自創人造語時，所用的筆名，原意是「期盼」。希望未來，他創造的符號能為世人接受，成為溝通的工具。提倡世界語之人，寄望使用語文改革的方式，為當時國力落後的中國，尋找一個與世界接軌的入口。劉師培建議將《說文》內容翻譯為「世界語」，並附以小篆字形，將漢字存於世界語之下，作為一種歷史考據材料，以合科學之用。

清末提出對於《說文》的改造，無論是主張改為淺短之篇，或是譯為世界語，其主旨皆是為了切於實用，使一般人皆能使用，因在教育普及的觀念下，簡明易懂的辭典才有直接的學習幫助。且受國外風氣影響，促使眾人開始重視辭典之應用。如梁啟超〈幼學〉文云：

西人有書一種，此土譯者，命之為字典。其最備者，至數十巨冊。以二十六字母編次，古今萬國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據此編以讀一切書，罔有窒矣。中土歷古未有是書。楊氏《方言》，意蓋近之。今宜用其意，盡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編定，以助學者緝檢之用。……學者既通文法、明大義，苟得此書，則可以盡讀羣書，無不能解者。其所譯定西人名稱，即可為他日國語解之用。雖非徒蒙拾之助，而學童得此，其成學更事半功倍也。⁴⁸

梁氏以為，中國可仿西方字典，將「天下之事物」編定成書，可為學者翻檢之用。同時可藉此譯定西人名稱，避免當時各家翻譯西語所用語詞不同，因而造成混亂

⁴⁷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國粹學報》第 4 卷第 9 期（1908 年），頁 11-14。

⁴⁸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 17 冊）：幼學〉，《時務報》第 18 期（1897 年），頁 1-3。

之情形。且對於學童讀書，學習各種知識，亦有所幫助。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嘗提及：

甲午戰敗後，進入二十世紀，為求具體快速接收西方各種專門學，大量翻譯西洋論著，尤其是透過日語譯本的再譯本，這些譯著中出現大量無法立即理解的新詞語，於是需要類似使用手冊的用語集，以方便翻查。……而表現得最清楚的莫過於晚清以降大量編纂的詞書，尤其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黃人編纂之《普通百科大辭典》，就明白標舉是為蒐集一切「學語」、調查種種「專門學」，特別關乎各種「新學科」如何分類與實際施行。⁴⁹

黃人（1866-1913），字摩西，任教於東吳大學。其著《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凡例〉云：

本書蒐輯一切學語，調查種種專門學書籍為基礎，中外兼賅，百科並蓄，以適用於教員考檢，學子自修為宗旨。

一切學語以學部鑒定為主，餘則取通行最廣者。

吾國新名詞大半由日本東渡輸入，然所用漢字，有與吾國習用者相同而義實懸殊者，又有吾渾而彼畫，易涉疑似者，皆隨條分析。⁵⁰

黃著《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旨在整理西學新名詞，尤其是從日語譯本而來的新名詞，以方便學習西方新知。日譯西學名詞在清末開始流行，除因地域關係近，容易產生影響外。更直接之原因在於當時編英語字典的人們為了便利，照抄了日本所編的西洋語言的譯名，也因此使用日本譯名成爲一種風氣。⁵¹關於《普通百科新

⁴⁹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頁99。

⁵⁰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頁1。

⁵¹ 劉寧：〈清末民初中日英漢辭書編纂的相互影響〉，《中國出版》18期（2018年），頁63-65。

大辭典》之性質，陳平原云：「嚴格說來，黃人主持編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只能說是有『百科』視野的『大辭典』，或曰『百科性詞典』。之所以稱其為『百科性詞典』，而非『語文辭典』，起決定作用的並非詞條的長短，而在於詞條所關注的中心點是在語言以外的世界，在於客觀物件本身。一定要說此乃『早期的百科全書』，也勉強說得過去。」⁵² 據此，黃書性質近於今日之百科全書，而書中所羅列的新名詞條目，對於西學名詞使用的固定及通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再如〈辭典發行之盛〉云：

日本近年出版界中，各種辭典，頗極發達。編者既層出不窮，購者亦陸續不絕，苟附有辭典之名，無不易售者。其編輯之內容，亦漸完整，日人據此為其科學進步之一證，此論固然，然竊謂彼邦辭典之暢銷，亦因中國留學生在彼者多購所致。其實日本諸辭典不盡適吾人之用，能自為編輯發行之則善矣。⁵³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大敗後，對於學習西學更加重視，因此更為推廣留學制度。至二十世紀初期，清廷覆亡前十年，留學日本之學生人數達到高峰。日本躋身東亞強國，在當時出版了許多的辭典，以為是科學進步之證明。留日學生也多所購買，進而對於中國傳統辭書產生影響。章小麗《日本辭書對清末中國的影響》云：「傳統的字書概念，由於現實中專科辭典、百科全書的實際編輯，而受到潛移默化的沖擊。清末十年，正是傳統字書在日本因素的影響下，轉為新型辭書概念的時期。」⁵⁴ 清末以來，在西方學術沖擊之下，傳統字書、辭書的內容及形式已難為時用，而日本西化改革較早，加之大量留學生赴日，因此影響了中國新式辭書之發展。

⁵² 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07年3月），頁62。

⁵³ 不著撰人：〈辭典發行之盛〉，《教育世界》第139期（1906年），頁5。

⁵⁴ 章小麗：《日本辭書對清末中國的影響》（浙江：浙江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7年），頁60。

日本所出版之辭典，畢竟屬外國辭典，使用上難免有所不便。因此，時論提倡應自編新辭典以為用，而傳統字書已不合時用，如署名愛讀子〈讀書所需之器具〉云：

中國所有字典，眼前自以《康熙字典》為佳，惟當日雖集大成，目下則有數缺：一、所載之字太多，於日用無涉者，為學生計，俱可刪除。……二、解釋太深，不合學生程度。……三、成句及聯用字樣，似尚未備，近日普通及理科新名目更當補入，此合用之字典，所以尚有待也。為今日計，則凡讀書之學生，人人皆須備字典一帙，以備隨時參攷。不佞曾見中西文並習之學生，於英華字典必有一冊，而國文字典則竝不購置，或至全學堂內竟無一部，詎非怪事咄咄。然其弊病大矣，每遇一生字，望文妄讀，不考其正音變音，正體俗體，原來之義、轉借之義。⁵⁵

《康熙字典》為清初官定辭典，是康熙皇帝親自下令編纂。虞萬里以為：「最直導致聖祖要想編《字典》的是《清文鑑》的纂修成功。清朝以滿族入繼大統，文字不同、語言不通，政策措施的施行極為不便。」⁵⁶所謂《清文鑑》，即是滿語字典。因清初流行之字書不佳，故康熙欲編成一書，以為官方所用。《康熙字典》收字甚多，是古代字書之集大成者。到了清末，清初官定之《康熙字典》已不適合一般學子使用，大眾所需要的是簡明易懂的實用辭典。且《康熙字典》所收以單字解釋為主，缺乏多字的詞或聯綿詞的解釋，不便使用。前論清末朱起鳳《辭通》，即屬於聯綿字之辭典。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學習西文的學生必皆購買英華字典以為學習，但國文字典卻無人使用。對此現象，一方面表現出當日尚缺適合學子使用之辭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學之流行，已讓學子開始輕忽國文之學習，而直接面臨的問題就是中文能力的低落。

⁵⁵ 愛讀子：〈讀書所需之器具〉，《青年（上海）》第10卷第9期（1907年），頁1-3。

⁵⁶ 虞萬里：〈《康熙字典》總閱官、纂修官行歷考實〉，《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外來文化的引進，生活中出現許多的新觀念、新名詞，一時難以了解。加以許多常年在外國的留學生，對於本國之事，反而較為陌生，因此對於新式辭典的需求，由此而生。近代最早一部以語詞爲主的新式辭典，爲陸爾奎（1862-1935）主編的《辭源》，是書於 1908 年開始編纂，至 1915 年完成。全書收單詞一萬多個，詞目約十萬條。除去單字和一般詞彙之外，還包括成語、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名、物名、書名、音樂、技藝、醫卜星相，及動植物等各方面的材料和新名詞，並博采當代外國辭書之優點。且對於清末至五四以前的西學和社會面貌、思想狀態，皆有所反映。⁵⁷陸爾奎論其編纂《辭源》之動機，云：

癸卯甲辰之際，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然行之內地，則積極消極、內籀外籀，皆不知為何語。由是縉紳先生，捫絕勿觀，率以新學相詬病。及游學少年，續續返國，欲知國家之掌故，鄉土之舊聞，則典籍志乘，浩如煙海。徵文考獻，反不如寄居異國，其國之政教禮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毀棄一切，以言革新，又競以舊學為迂闊，新舊扞格，文化弗進。友人有久居歐美，周知四國者，嘗與言教育事，因縱論及於辭書，謂一國之文化，常與其辭書相比例。……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⁵⁸

文中「癸卯甲辰之際」，指 1904 年 1 月，張之洞（1837-1909）等人進呈〈學務綱要〉，是爲「癸卯學制」，代表傳統私塾教育轉型爲新式學堂，一時學風巨變，以西學爲盛。舊學與新學互相排斥，溝通不易。有鑑於此，《辭源》可提供中文能力不佳之留學生，與舊學之士，有一參考書籍，以作爲新、舊學者知識傳播之管道。且陸氏受西方文化影響，所謂「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故欲編成一部新時代之辭典。其實中國本來具有非常豐富的辭書文化，只是時代轉變，人民

⁵⁷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畧》，頁 233-234。

⁵⁸ 陸爾奎：〈辭源說略〉，《東方雜誌》第 12 卷第 4 號（1915 年），頁 13-16。

需要切於實用的新式辭典，才能面對新時代的轉變。平田昌司以為，《辭源》所收詞條，不再受「清真雅正」的制約，有別於以傳統八股文為典範的語言制度。⁵⁹

陸爾奎作《辭源》，目的固然是成為新、舊學者知識傳播之管道，但更重要之意義在於教育之普及化，為社會各階層人士使用。陸氏在當時極力推廣國民普及教育，如其〈論普及教育宜先注重宣講〉云：

教育之大別可分為二：一曰人才教育，一曰國民教育。人才教育者，培植應用之人以為百執事者也。國民教育者，以本國立國之宗旨，培養人民而使之統同齊一，以為國之精神元氣者也。故國民教育視人才教育為尤重，無一人不為國民，即無一人不當受國民之教育。受教育者半、未受教育者半，則國民之智力必為未受教育者所牽掣；受教育者一二、未受教育者八九，則已受教育者，且必同流合污，舉其所得之知識漸歸於消滅。故不普及不能收國民教育之效，亦即無所謂教育也。⁶⁰

陸氏提出教育類型可分為二種，一為「人才教育」，即培養專業人士；另一為「國民教育」，即所有國民皆須接受的教育。其中「國民教育」尤為重要，是國家之根本，必使其普及於大眾，方能受教育之成效。因此，陸氏編纂性質屬百科常識辭典之《辭源》，正可幫助教育之普及，且因辭典具有獨立自學之方便性，隨時都可以查閱，對於當時而言，亦是知識傳播之最佳工具。徐時儀亦肯定《辭源》對於現代辭書具有典範意義，其《漢語語文辭書發展史》云：「《辭源》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編纂的指導原則，適應了開啓民智和提升中華文化民族素養的社會需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現代闡釋及條理化，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教育的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⁶¹

⁵⁹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頁274。

⁶⁰ 陸爾奎：〈論普及教育宜先注重宣講〉，《教育雜誌》第1卷第1期（1909年），頁1-4。

⁶¹ 徐時儀：《漢語語文辭書發展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頁461。

四、結語

本文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體例的改變及影響」、「從清末報刊論《說文》觀念之變化」兩點，探討清末《說文》觀念的轉變及對於辭典發展之影響。朱駿聲現代雖被稱為《說文》四大家之一，然而在清末之前，朱駿聲《定聲》的評價，是不及段玉裁、桂馥、王筠三家的。朱書採「以聲統字」、「以聲為綱」的方法，將《說文》全書重新進行編排，這在尊崇許學之氛圍中，必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定聲》學術評價在清末轉變之原因，在於改造《說文》體例，擴大了字義的內容，給予後世編輯及研究辭典之學者，建立了基礎。如朱起鳳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編纂《辭通》，其理念與朱氏《定聲》以「假借」方法整理詞義有所相通。胡適從辭書學之角度評價《定聲》，認為其書會通聲音訓詁，體例與方法都稍勝前人，是一部有創見的辭書。王力以為《定聲》最大的貢獻在於字詞的解釋，擴大了以《說文》本義為中心的系統，強調引申義與假借義的重要性。王力〈理想的字典〉即主張，一部理想的字典，要能「明字義孳乳」，說明字義的時代演變軌跡。昔日朱駿聲改易經典之大過，已不再受到學者之批評，反而認為《定聲》改易《說文》體例，超越許慎《說文》原有之框架，正是其重要創見所在，對於近現代辭典產生影響。

清末學部編譯圖書局向民間徵求自編教科書，上呈的自編教科書不論是否通過審查，學部都會將評語公告在報刊上。評選合格成為部定教科書者，固然符合官方之標準，而落選的書籍同時也能反映出當時學術風氣的轉變。在晚清報刊所公布的評選書目中，不乏許多以傳統舊學思維編纂教科書者，其中有受清代由傳統小學之識字通經觀念影響，以改編小學經典著作《說文》作為教科書者，如宣澍甘《說文聲母歌括》及桂潔《經註說文徵實》，皆未獲審查通過為部定教科書，學部審查人並建議參考外國辭書，編纂日常實用之辭書，昔日辭書以許慎《說文》為中心之識字通經觀念，已有所改變。馬建忠《馬氏文通》吸收西方語言學之研究方法，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學術，則獲選為學部審定中學教科書，並得到很高的評價。馬氏提供學子用一個更具體明確的方式，學習及理解漢語言文字，藉

此學道明理，並會通西學之道。講求實用，以自強於世界。清末教育改革的影響下，《說文》不再是讀書人必備之工具書。且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外來文化的引進，生活中出現許多的新觀念、新名詞，一時難以了解，因此產生對於新式辭典的需求。近代最早以語詞爲主的新式辭典，爲陸爾奎主編的《辭源》。陸爾奎作《辭源》，目的固然是成爲新、舊學者知識傳播之管道，但更重要之意義在於教育之普及化，爲社會各階層人士使用。因辭典具有獨立自學之方便性，隨時都可以查閱，方便於知識傳播。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清)謝啓昆：《小學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1冊(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王力：《王力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朱起鳳：《辭通》(臺北：開明書店，1982年)。
朱維錚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
徐時儀：《漢語語文辭書發展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
章炳麟：《小學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章氏叢書》上)。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1992年）。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畧》（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年）。

鄭毓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17年）。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二）期刊論文

不著撰人：〈學部搜求教科書籍〉，《四川學報》第2期（1906年）。

不著撰人：〈學部嚴查冒充審定書籍〉，《直隸教育雜誌》第9期（1906年）。

不著撰人：〈學部不審定韻語書〉，《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卷第2期（1906年）。

不著撰人：〈辭典發行之盛〉，《教育世界》第139期（1906年）。

不著撰人：〈論學部編纂之教科書〉，《廣益叢報》第139期（1907年）。

不著撰人：〈記日本說文會之臨時大會〉，《國粹學報》第4卷第12期（1908年）。

不著撰人：〈學部審定中學教科書提要（未完）〉，《教育雜誌》第1卷第1期（1909年）。

不著撰人：〈學部頒行各省查禁偽造學部審定教科書文〉，《教育雜誌》第2卷第12期（1910年）。

不著撰人：〈浙江舉人宣澍甘呈所編說文聲母歌括請審定批〉，《學部官報》第137期（1910年）。

不著撰人：〈成都縣附生桂潔稟呈經註說文徵實一案〉，《四川教育官報》第8期（1910年）。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16冊）：幼學〉，《時務報》第17期（1896年）。

梁啟超：〈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續第17冊）：幼學〉，《時務報》第18期（1897年）。

陸爾奎：〈辭源說略〉，《東方雜誌》第12卷第4號（1915年）。

- 陸爾奎：〈論普及教育宜先注重宣講〉，《教育雜誌》第1卷第1期（1909年）。
- 葉瀚：〈啓蒙字書音目〉，《蒙學報》第1期（1897年）。
- 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2期（2007年3月）。
- 華通齋：〈改良文字會之緣起〉，《直隸教育雜誌》第8期（1907年）。
- 愛讀子：〈讀書所需之器具〉，《青年（上海）》第10卷第9期（1907年）。
-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國粹學報》第4卷第9期（1908年）。
- 劉寧：〈清末民初中日英漢辭書編纂的相互影響〉，《中國出版》18期（2018年）。

（三）論文集論文

- 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徐蘭君、（美）瓊斯（Jones,A.）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虞萬里：〈《康熙字典》總閱官、纂修官行歷考實〉，《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四）學位論文

- 林明波：《清代許學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嘉新水泥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二十八種，1964年）。
- 章小麗：《日本辭書對清末中國的影響》（浙江：浙江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07年）。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huo W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Chung, Che-Yu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bstract

Zhu Junsheng (1788-1858) reformed the style of *Shuo Wen*, expanded the content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cholars who edit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Ding sheng” changed the “*Shuo Wen*” style, it is the important creative place, which has an impact on the modern and modern dictionary. This is the intrinsic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Shuo W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eople asked for self-edited textbooks, reflecting that the concept of “*Shuo Wen*” as the center has been changed. “*Shuo Wen*” is no longer a necessary tool for scholars. At that time, the society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studies, the knowledge system chang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 dictionaries wa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new things and to learn in time, the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ate Qing, Dictionary, Press, *Shuo Wen*, Textbook